



【温酒闲谈】

观察短期交易数据,的确有资金净流入港股通。

温天纳

国家会否在本周(或5月内)宣布落实“深港通”,正反两论点均存在,不过答案很快揭晓,笔者不妨在这里作一个探讨。

虽然普遍都认为深港通必然是在今年之内实行的事,但是投资者都希望可以准确抓到宣布实行的时间点,以便及时作部署并从中获利。

认为本周(或5月之内)会宣布实行“深港通”的理由包括:

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先生赴港出席5月18日的一带一路论坛。市场预计国家领导人会带来好消息。

其二,如在6月前启动深港通,A股被纳入到MSCI系列指数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其三,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早前香港特区政府及港交所领导表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有深圳大型券商亦指,他们已参与深交所的多轮联网测试,工作进展顺利,只等中央决定开通的具体时间。

认为在本周(或5月之内)不会宣布实行“深港通”的理由包括:

其一,深港通一直由国务院辖下的证监会、人民银行负责处理,两年前正式宣布“沪港通”的领导人亦是国务院总理。对于“深港通”开通时间,早前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表示,特区政府争取尽快开通,香港已经准备就绪,争取国务院方面能够尽快宣布。故此市场有人士认为深港通开启具体还得等国务院宣布,与人大委员长来港时间点没有必然关系,领导此次来港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一带一路。

其二,环球市场6月份有两大动荡因素,一是美国联储局议息会议讨论加息,二是6月23日英国就脱欧举行公投。中国政府有可能想在潜在不确定性明了之后才启动深港通。

其三,深港通延迟开通,也不影响今年6月A股可能获纳入MSCI指数的决定,因为指数组合以大市值股份为主,对深圳股票的配置不会太多。故此,有人认为深港通在6月过后实行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因为能避免环球不确定因素导致的股市动荡,降低深港两地投资者的风险,尤其使市场上憧憬“深港通”会把中小型股票(如创业板)都纳入在范围里。

近期市场传言,“深港通”除了大型指数股外,还将涵盖两地的中小型股,例如创业板指数股。另外也有传闻今次深港通的投资门槛会降低,过去

内地个人投资者必须在投资证券及资金账户余额有50万人民币或以上才可以投资港股通,有说这个门槛会降低到10万元人民币。

先从深港通角度看。有人认为深圳A股比上海A股可能更具投机性,深圳A股对比港股沪股在平均估值上都比较高,而且深A有创业板中小型股票,而且多为消费及新兴产业(如资讯科技行业)股票,有话题性的股票相应也比较多。所以,估计风险偏好比较高或者对新经济产业感兴趣的投资者,对深港通的关注度会比沪股通要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两地有不少投资者均在2015年7月股灾后损失惨重,以致风险偏好降低并且可投放在股票市场投资的资金也减少。因此“深港通”火热度如何,具体还要看到

时候投资者是持续谨慎观望甚至只是有限度参与,还是视这个为翻身拼命的机会了。

再从从港股通的角度看。同样地,香港创业板和中小型股票(如壳股概念的股票)也是因为这些缘故而吸引很多内地投资者的关注。当然也有一部分投资者会倾向于投资香港的大型股票如银行股、保险股等,但有人则认为这次深港通开通对香港大型股票的交投刺激不会非常大,希望投资这些股票的投资者早就可以通过沪股通去执行了。不过,观察短期交易数据,的确有资金净流入港股通。始终,近期港股和外围实况偏空,使港股估值走低吸引投资者作长线价值投资。此外,不排除有部分投资者预期“深港通”开通后港股会回暖而暗中作准备。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经济学可以和佛学一起学

沈凌

不少人都这样认为:学好经济学,就会崇拜市场主义,但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不应用于所有的场合,所以经济学的作用有限。针对魏则西事件,有人就重提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认为医疗行业就是一个不能利润最大化的行业,就是一个必须由政府来操办的行业。这样的观点其实很普遍。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之后,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要不不让政府来办?

是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消费者把个人效用最大化,企业把利润最大化”。实际上,经济学并不是提倡(或者认为应该)实现这一最大化,

经济学是假设了人们会把个人福利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然后问题来了:“如何才能运用有限的资源去尽可能这个最大化目标呢?”这才是现代经济学认为的自己能够研究的问题。

这样的假设,其内涵可以比一般人想象的丰富。比如一个利他主义者的行为,貌似不能用“如何才能把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来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误解。一般来讲,利己主义者的个人效用是自己吃饱了的幸福感,所以一般来讲,经济学研究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让自己吃得最饱,最幸福。这是一个利己主义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利他主义者,其“个人效用(福利)”是看到“别人吃饱了的幸福感”的话,那么经济学同样可以研

究“如何把有限的包子给别人吃”,以至于让这位利他主义者感觉到最幸福最满足,这也是一个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和利己主义者故事并无不同。

所以,即使是信奉佛教的寺庙,同样需要借助经济学去解决如何安排僧人去施粥,以便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得益。如何募集善款?如何使用善款?买什么价格的米熬粥?如何分发?都会涉及及经济学问题。募捐善款的时候把募捐多少,和放置牌位的大小,以及在佛前的位置挂号,实际上就是在使用市场经济的规律,隐含着一种等价交换和市场竞争的原则。

有人说:领粥的人每人都只能一次领一碗的限制,不就是违背了市场经济价高者得的原则了吗?我说不是,

让每人都只能一次一碗,实际上这是运用了市场原则。因为这相当于让穷人用自己的时间来作为支付手段“购买”粥,你太饿一碗不够,就多排几次队,多支付你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时间一天都只有24小时,这样的支付手段对每个人来讲比较公平。但是如果如果没有这样的支付手段,不运用市场原则,可能就会乱了套。比如一个大胃口的人排在前面,一口气喝光了一锅粥,他很饱很满足了,但是后面一堆人可能就一口也喝不上,全部饿死了。这样的结果显然不符合信佛的施粥者的“个人效用”。

所以,学佛的人想要管理好寺庙,还是需要一点点经济学。反过来,经济学也需要佛学的帮助去完整的理解人

的选择问题。因为经济学只研究“给定个人效用,如何最优配置资源,以便效用最大化”,而佛学其实是在研究“给定了有限的资源配置方式,如何去调整个人的效用,来使得自己得到满足?”作为渺小的人,我们往往发现力不从心,明明看到了一个最优的资源配置手段,却不能实现,不能达到我们心中所想,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有失落感挫败感。这时候,资源的配置方式其实是给定了,或许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自然规律的约束,这时候,我们心烦意乱,可以通过适当的自我调理,减低或者修正我们的个人效用来达到目的。或许这就是佛学,我不太懂,姑妄论之。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人并不总是活在逻辑里

木木

北京电视台有一档“家庭纠纷调解”类的节目,据说收视率提高,影响力很大,许多家里闹得不可开交的,跑去调解室寻求嘉宾的专业调解。

打作一团、甚至势同火水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面对镜头很“坦率”地把家丑翻晒在观众面前,应该是极需要勇气的吧;“欣赏”这样的节目,大约,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老话儿说,“家丑不可外扬”。这话说得没错,于一些老北京人而言,把面子看得更不得了。跑到电视台去现场调解家丑并播了让人看,不是遇到了实在迈不过去的坎儿,没人肯这么干。导致这些人舍了脸面跑去让人点判自己家事的最主要原因是财产纠纷,尤其是房产纠纷。这十多年来,北京房价暴涨,拆迁补偿的水平也是快速飙升,原来没人看上一间小破房,都能把家里搅得鸡飞狗跳,可见,在金钱、利益面前,保持淡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别看一家人打得热火朝天,嘉宾们调解起来,围绕的也不过“情、理、法”三个字。最后,大多数人好像都能接受调解,也是,说“情”不管用,还有“理”,“理”也讲不通,还有“法”管着,只要专家把这个底线一亮出,往往初看起来挺难调解的一家人,最终也能心平气和起来。

法律离不开一个“理”字,以强制力约束人们讲理,就是法律的力量所在。而“讲理”,本质也无非就是要讲“逻辑”。而貌似高深的“逻辑”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为大众公认的由此及彼的路径和规律罢了。人们说话、办事儿,遵循了如此的路径和规律,别人往

往就会做出“这个人挺讲理,办事儿靠谱儿”的评论;反之,大家一般就要有意见。比如,甲借了乙的钱,不想还了,于是搞出一个“债转股”或者“破产”出来,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大家只要都讲理、都有逻辑地讲话、办事,这个世界肯定就简单得多。不过,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让自己活得“简单”一些,但“人”这种动物,复杂甚至不可捉摸得很,让其“讲理”、“讲逻辑”实在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这就是本文的题目由来;其实,题目的说法还是比较委婉——追求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我想说的是,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绝不肯活在逻辑里的,当然是自己不肯却无不希望其他人都圈在规矩里。

这不是瞎说,随便翻翻人类的历史,这种事儿多了去了。前几天,欧洲人很郑重地表达了一下不承认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的观点,于中国人看来,这就有点儿闭着眼睛不讲逻辑;还有菲律宾,把南海的所谓“问题”提交给什么法庭去仲裁,也很不讲道理。这么做,总之让人不舒服,如果他们再顺着如此的思路做点儿什么,就一定会更让人不舒服。不过,不舒服归不舒服,中国人对外一般还是很讲道理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讲理的一般都干不过不讲理的,这就难怪,大家都越来越不怎么讲道理了;甚至有些自誉为特别讲道理的人,在批评别人没逻辑的时候,居然也往往习惯成自然地使用不讲道理、不逻辑的方法。这就是习性的力量,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倒再次印证,作为一种“感情动物”,人,自始至终都要活在感性世界里,许多时候,是真用不到“逻辑”来帮忙的。

特朗普虽然“嘴大”,但就是很招人喜欢;陈水扁再贪污,照样有“铁粉

儿”拥戴,甚至据说连蔡英文都要请其赴自己的“就职”宴会。你看,人就是这样。当年,王小波正火的时候,本人也凑热闹几乎买了其全套儿作品,尚未及看,李银河也火了起来,由于对其一些观点有“偏见”,本人就对王小波的作品也没了兴趣。

人,总活在逻辑里,大约只能是未来“机器世界”的场景,那样的世界,想想也觉着有点儿乏味。或许,也正是因为“逻辑”总是动不动就跑得没了踪影,人的世界倒格外的精彩纷呈吧。每天睁开眼睛,马上就有五颜六色的趣事或者烦事扑面而来,想想都让人很期待。难道你不觉得崔永元、方舟子吵架很精彩吗?可惜,他们以及其他的那些“感性动物”,已经很久没开骂战了。哎呀不好,我好像也违反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吧,没有文明表达?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北方丝织品的南移

王国华

魏晋时期,原先只盛产于北方的桑蚕业开始南移。这一方面源于南、北方的士大夫阶层对彼此物品的需求,一方面也因为人才和技术的南移。

说到丝织业人才南移,不得不提到当时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大融合。无论干什么,人都是第一要义,没有人才,其他都是白扯。

东汉末年直至魏晋,群雄并起,中央政府长期软弱未能实现大一统。与此同时,有一种叫做“部曲”的组织出现。最初,士族大户为了自保,把宗族、宾客、佃户、门生、故吏等组织起来,平时种地,战时出兵。许多苦于战乱的农民无路可走,纷纷投奔过来请求保护,

而士族大姓正需要扩充规模,于是来者不拒,私家部曲。这种部曲相当于私人武装,全体人员只效忠“主公”一人。曹操手下的兵将只认曹操,不认皇帝,司马懿的手下也只认司马家族的人。部曲和主人之间是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各地军阀动辄带着部曲(甚至席卷整个郡县的人)一起东奔西走。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者已与农民共同沦为半奴隶状态。而有特别技能的人,为武夫将军所需要,则尤不愿意给以自由。

掌握丝织业技术的那些人,原本在北方老家生活得好好的,但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裹挟在逃难者、流离者、被俘者、胜利者的队伍中,跑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这里有几个例

证:刘裕灭姚秦,迁关右(亦称“关西”,汉唐时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百工来到南方。南朝的丹阳,有官设的“锦署”,专门为皇家服务,这些工匠即来自关右的“百工”;北魏武帝灭后燕,徙山东六州民吏及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三月诏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随着丝织人才的流动和南移,南方宫廷里出现大量用织工。陆凯曾经上书给当时的吴主孙皓说,“先帝时,后官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依闲织络及诸伎,乃有数千”。他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织工太多会带来奢靡之风。但在广大民间,提倡桑蚕之业逐渐成了应有之

义。《三国志》中,有位姓华的大臣向孙皓建议应“广开农桑之业,积不啻之储(不可估量的储藏)”,“宜智息众役,专心农桑”,并得到了正面回应。有了政策上的支持,民间的呼应,就有了对丝织业的认可共识。

同时,织机技术也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提高。织机的构造不像耕具那样守旧,在三国时期颇有改进。《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记马钧改良织机的事,说他“为博士居贫,乃思织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织机五十综者五十踏,六十综者六十踏。先生惠其良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踏。其奇数千”。他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织工太多会带来奢靡之风。但在广大民间,提倡桑蚕之业逐渐成了应有之

到南方。这还有归功于人口的流动。

南方的丝织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征收的各种赋税中,开始布绢皆收。晋书中提到,苏峻攻陷京城,发现宫中收藏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这说明,绫罗绸缎不再是北方的特产,已经在南方扎根发芽,逐渐壮大。

也许有人说,看来是大规模的战乱促进了北方丝织业的南移,这么说战争也有积极意义喽?其实不然,战乱只是把北方的丝织业带到南方,而丝织业真正在南方发展起来,还是相对太平的隋唐时代。战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但那些将发展归功于战乱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作者系深圳作家)



【经济钩沉】

战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但那些将发展归功于战乱的人,都是别有用心。